

第四章 1995-96 年共軍對台軍演之謀略體系

第一節 中共軍事謀略的總體環境 (Aspect on Nation Security)

一、美中台的軍事謀略觀點

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其對台政策的目標與政策是一貫的，總和而言，即一個目標「消滅中華民國」、「兩手策略」即「以戰逼和、以戰逼降」，「四個戰場」即「國內、國外、台灣、國際」。演變到 1995-96 年台海第三次危機，中共的戰略則在「竭力阻擋台灣強化主權的作法」，而台灣「則設法防止大陸將之矮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省的可能性」，美國則是力阻中共軍事犯台影響東亞區域安全及美國利益，警告台灣自制，避免引起軍事衝突，美中台三方面的軍事謀略觀點與作為，為三邊關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手段則經歷了武力進攻到武力施壓，進行遏制為主、和平誘導為輔，再到和平誘導為主、必要時輔以武力動作的變化。¹³⁴美「中」台雖有走向軍事衝突的可能，三方若了解此一危險性，願意避免跨過危機門檻，仍有很大和平共處的機會。¹³⁵因為中共雖不諱言和平需要靠武裝的保衛，亦強調它更需要靠和平與發展去爭取。¹³⁶平心而論，民進黨執政後，北京對台政策面臨了結構衝擊與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在持續「聽其言，觀其行」期間，北京也展現了高度的節制與務實的彈性。中共真正在意的問題是要確定台灣不會獨立，依此推論，如果談判不意味著台灣會走向獨立，北京就有可能接受不把「一個中國」原則當作重開談判的前提。這可作為我們思考的重要方向。

(一) 中共的軍事謀略與國家利益

中共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有三：1.是指國家統一目標要持續，推動積極防禦戰略，2.維持穩定國內環境及 3.強化區域影響力。而劉慶元先生在研究中共國家安全戰略有四個發現可供我們參考：1.國家利益影響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思考方向，2.和平與發展是後冷戰時期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意涵，3.「新安全觀」

¹³⁴ 張山、肖偉中，《遏止臺獨?不承諾放棄武力》（台北：遠景出版社，1997），頁 173。

¹³⁵ 王銘義，《中共和談：臺灣與中共對話》（台北：財訊出版社，1997），頁 301-304。

¹³⁶ 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302。

是現今中共綜合安全戰略思考的體現及 4.全球化形成了對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危機與轉機。¹³⁷

中共自 1995 年 7 月 21 日至 26 日、8 月 15 日至 25 日及 1996 年 3 月 8 日至 15 日、3 月 12 日至 20 日、3 月 18 日至 25 日發射導彈及海空實彈演習，並設置「對台軍事指揮部」成立「南京戰區」。¹³⁸

就軍事謀略的觀點而言，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前述三項目標期望在 1995 年第三次台海危機中，是有效執行的，試射導彈是謀略的「示形」，軍事謀略的「威懾」以及軍事謀略原則「最優原則」—台灣無反飛彈系統，此次中共試射的飛彈為 M-9（即東風 15 型），即為針對台灣所設計¹³⁹；實施武嚇，並且很快的說：「絕不會變成真的作戰」是軍事謀略的「攻心」，發揮了謀略的特性「求全勝」，而飛彈試射了十枚，比原預計的 20 枚為少¹⁴⁰，顯示中共在提昇解放軍的地位，另外轉移目標到李登輝、中共對其的憤怒，此次中共軍演在軍事謀略上，可以說中共運用了軍事謀略的基本原則，「整體系統謀劃原則」，有效的執行了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

為應付突發的事變（非國際戰爭性質的事件），中共會採取各種謀略（Stratagem），諸如縱橫捭闔、虛虛實實、偽裝欺敵、變化多端。實際上是有一條底線的，就是不能違背總路線，中共常說，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節」就是這條底線。以對美關係為例，在國際關係中，對美關係是一個重大的矛盾，必須正確處理。美中的鬥爭集中在霸權主義和反霸權主義的鬥爭上，時張時弛。在發生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飛機擦撞事件時，中共曾在國內發動大規模反美遊行示威，對美提出嚴重抗議，江澤民一度曾說要準備打仗、準備打大仗。但最後均以妥協結束。

維持有效的謀略威懾。謀略威懾已經成為國際安全框架的基石之一，因此，中共必須維持有效的「最低限度核威懾」，以阻止任何潛在的敵對力量威脅中共生死攸關的利益。美國和日本要發展的導彈防禦系統是能使國際安全環境發生結

¹³⁷ 劉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略〉（台北：揚智文化，2003），頁 3。

¹³⁸ 吳恆宗，〈中共對台文攻武嚇與兩岸關係〉（台北：政戰學校，1996），頁 2-12。

¹³⁹ 麥利凱（Zvic A. Mcvandon），〈人民解放軍海軍針對台灣進行的軍事演習、準則與戰術〉，《台灣有沒有明天》（台北：先覺出版社，1998），頁 283。

¹⁴⁰ 同上註，頁 212。

構性變化的最危險因素。一旦導彈防禦系統被成功部署，它將從根本上動搖二戰以來的國家安全理念：即國家的安全是基於相互依賴和相互威懾的安全，因此國家的安全是相對的。在這樣的謀略態勢下，任何一國或陣營單方面發展導彈防禦系統都將打破建立在相互核威懾上的相互依賴的安全概念，使進攻重新壓倒防禦，從而大大增加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導致新的軍備競賽。對中共而言，對台軍事演習的意義可能不僅限於對台灣的威嚇，還包括向美國警告中共具備相當的飛彈反擊能力，例如中共曾經對美發出飛彈足以威脅「洛杉磯」的警語。

（二）美國的軍事謀略與現實考量

林爵（Dr. Arthur Maldron）在兩岸關係的美國觀點中指出，「兩個國家，共存於一種曖昧不穩的關係中，緊牽扯到美國的安全利益」，而中共將台灣問題視為美中關係的重要議題及中國國內政治是具象徵意義的問題，所以鄧小平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與台灣回歸祖國是兩件事併為一談的。¹⁴¹但美國不如此認定，在三個公報及台灣關係法中均強調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問題，即不支持台灣獨立，亦反對中共動武。我們回顧尼克森大陸之旅迄今，美台關係除了外交形式及禮儀，其它的變化並不大，雖然當年季辛吉等人在卡特宣布「廢止斷交撤軍」不看好台灣的未來，如今台灣仍屹立不搖，反而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一大重要支柱。外傳中共曾揚言，「台灣重要，抑或洛杉磯重要？」¹⁴²點出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面，但進一步思考，台灣的安全不僅是美國重要利益，也是區域平衡和穩定的一環；尤其中共沙祖康曾說：「不對世界各國家使用核武，但台灣不是國家」。這倒向美國提出了一個警訊，在中共武力犯台、美軍介入之時，核武的運用則是決定因素，美國可以毀滅中共廿次，中共只要毀滅美國一次即可。

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機，陳一新教授指出：「美中台三方都可以說犯了一些錯誤」，但對美軍派出獨立號及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表示決策是正確的。¹⁴³

¹⁴¹ 林爵（Dr. Arthur Maldron），〈兩岸關係的美國觀點〉，《台灣有沒有明天》（台北：先覺出版社，1998），頁357。

¹⁴² 陳一新，〈柯林頓政府在台灣危機決策制訂過程〉，《遠景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頁127。

¹⁴³ 同上註，頁134。

就軍事謀略觀點言，柯林頓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不僅是軍事目標的達成，也是政治目的的達成，柯林頓在 1996 年 4 月中旬，停泊在東京灣的航空母艦向 5000 位官兵訓話指出「在沒有發射一枚砲彈的情況下，你們向太平洋所有的國家再度提出了保證」，此句話真是徹底的將軍事謀略的意義表明透徹，即「對抗的雙方」，運用「思維規律、活力對抗」所強調的「計謀策略、爭取勝利」。

陳一新教授認為美國行政部門在李登輝訪美事件後，對中共的反應過度低估。¹⁴⁴美國國務院曾負責草擬一份中共可能採取報復行動的備忘錄，原先有一項評估認為中共軍方可能採取行動，但亞太助理羅德卻認為情勢不致發展至如此地步，白宮根本不須為此操心，於是指示幕僚將該項評估從備忘錄中抽掉。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看過備忘錄後，也相信中共僅限於表面的叫囂，而不至於有外交或軍事上的大動作。¹⁴⁵自從布希政府出售台灣F-16 戰機未引起中共強烈反彈後，國務院基本上已經將後冷戰時代中共以斷交威脅美國的可能性加以排除，然而國務院顯然忽略了中共「以槍桿子出政權」的本質。

美國在中共對台軍演的表現上，一再澄清其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保證不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不搞「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表明無意圍堵中共。對於兩岸關係，美國堅持雙方必須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華府不同意任何一方以非和平的方式處理此一問題。華府對於原則性的問題一再重複，以澄清中共疑慮，但對具體事項則堅持不做明確承諾或道歉。在作法上，美國要求中共理性自制，勸告台北不要一味挑釁，對兩岸政府都有不滿及批評，對局勢的關切是由早先的適度曖昧，保持迴旋空間到後來的嚴重關切及提出嚴重警告，再到最後的軍力展示，由創造性的模糊到後來的戰略明確、戰術模糊。美國行動基本上屬於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的一環，仍有砲艦外交的影子，希望使兩岸關係維持現狀，避免再次捲入中國未了的內戰中。¹⁴⁶

¹⁴⁴ 陳一新，〈柯林頓政府在台海危機決策制訂過程〉，《遠景季刊》，2001 年第 1 卷第 1 期，頁 116。

¹⁴⁵ 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 286.

¹⁴⁶ 蔡瑋，〈第三次台海危機：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互動〉，《東亞季刊》，1996 年第 27 卷第 6 期，頁 41。

自從蘇聯解體之後，冷戰時期美蘇兩極對抗的時代過去了，美國的全球謀略無須「聯中制俄」，國際局勢進入後冷戰時期，世界各國莫不競相追求經濟發展，以代替過去的軍事對抗。但是經濟發展需要穩定和平的環境，後冷戰時期仍然存在著零星式的地區性衝突，尤其經濟蓬勃發展的亞洲，由於中共在經濟崛起之後，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展露出稱霸南海以及解決台灣的野心，造成亞太地區的安全威脅，可能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損及美國及其盟邦的利益。此外，中共在「天安門事件」違反民主及人權的殘暴本質，加上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堅持，在亞太地區企圖建立軍事霸權的野心，嚴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美國的觀點而言，中共已經取代蘇聯，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軍政利益的首要對手，甚至是假想敵。為了防範未然，美國的亞太謀略採取對中共「軍事上圍堵、經濟上交往」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軍事和政治上弱化中共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經濟上擴大交往，藉以影響中共，試圖形成蘇聯崩解模式的「和平演變」，來降低日益成型的「中國威脅」。美國的亞太謀略一向以美、日安保條約為防衛主軸。1996年3月間中共引發的台海危機，激化美國必須強化列島謀略防線。因此在四月間，柯林頓與橋本於東京舉行「美日高峰會」，簽訂「日美安保共同宣言」，美國與澳洲也在七月間發表了「雪梨宣言」，進一步加強兩國軍事聯盟關係，增加美國在澳洲的軍事演訓基地。美國國防部長裴利當時表示，澳洲是美國亞洲駐軍的「南方泊錨」，日本則是「北方泊錨」。謀略格局非常明顯，美國強化這兩支泊錨作為螃蟹的雙螯，藉以箝制中共，圍堵北京在南海的軍事擴張，並維護台灣海峽的航道安全。¹⁴⁷

表 4—1:美國與亞太諸國的防衛關係

日本	美日安保條約
南韓	— 95 三年美韓共同防禦條約
台灣	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
澳紐	— 95 一年美澳紐公約
菲律賓	— 95 一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泰國	— 95 一年美泰共同防禦條約

¹⁴⁷ 劭玉銘、李瓊莉、嚴震生，〈美國介入中共對台軍演決策過程之研究〉（台北：外交部專案研究計畫出版，1998），頁 45-60

新加坡	一九九〇年美新後勤設施使用諒解備忘錄
汶萊	一九九四年美汶防禦合作諒解備忘錄
馬爾紹群島 帛琉共和國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一九八六年自由聯盟（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Asia 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 1995.及宋學文、藍於琛，「小國外交的理論基礎：1996年三月台海危機中的美國—台灣—中共三角關係」，周世雄主編，兩岸政治外交總體檢，台北：河洛圖書，1998年，頁139。

（三）台灣的軍事謀略與生存發展

台灣是一海島國家，海空防禦作戰應是優先的謀略方針，這幾年海軍大力進行二代艦更新以提升戰力，包括原有船艦偵搜、通訊、武器系統更新，另向美國租用「諾克斯」級驅逐艦，也仿美國派里級巡防艦自造新艦，或向法國購置拉法葉驅逐艦，這些措施大大提升海軍戰力。兩岸的僵局是經過多年的歷史堆積形成的，它的複雜性在於具備了許多的層面和向度，¹⁴⁸既是現實問題，同時也涉及歷史觀與國際觀的差異與統合。北京要的最低標準是台灣承認「一個中國」，保證不獨立，並逐漸向最終統一靠攏；台灣的最低標準是「中共」保證不武力侵台、台灣維持有實質的主權地位以及應有的尊嚴。中共的目標因此是相互排斥的，以致多年來關係無法解凍。¹⁴⁹尋求武力均勢來維持和平，是人類的悲哀，欲走出此一無底的深淵，應是兩岸領導人共同趨赴的目標。

在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機台灣在軍事謀略方面有以下的問題：

- 一、軍事採購受到限制，買不到所需武器。
- 二、後勤體系的調整，如何整合台、美、法、荷...等武器支援系統。
- 三、中共恫嚇：數波的導彈試射威嚇。

¹⁴⁸ 簡單地來說，行為面，各有不同認知與符碼；心理面，彼此缺乏信任與相異的集體記憶及潛意識；制度面，是歧異的民主與集權生活方式；文化面，各有不同的主流核心價值與信仰系統；歷史面，中共有列強入侵的烙印，臺灣有被出賣的悲情；民族面，臺灣作為想像共同體正在建構自我主體認同的努力，與「中共」民族主義形成扞格；以及意識型態方面，冷戰、反共、反專制意識的延續等等。

¹⁴⁹ 〈邦聯制是中共弭言和和各取所需的最佳方案〉，《中國時報》，2000.12.26版3。

四、戰略兩難：即戰略孤立，外交國不到卅國，及戰略處境孤立、困難。¹⁵⁰

所以台灣戰略概述為：

1991年，李登輝宣布中止「動員戡亂時期」，表示台灣不再試圖以武力收復大陸。這項舉動的軍事意義雖然不大，但是確定了台灣大陸政策的基本轉變。配合和平共存與透過談判達到統一的新政治目標，台灣國防政策中的戰略構想，從「攻守一體」改為「守勢防禦」。也就是不再對大陸採取挑釁或先制的軍事行動。這種「純粹防守」的指導原則決定了台灣的國防政策。同時台灣的國防白皮書列出了台灣的國家安全威脅來自兩方面：（一）中共侵略。（二）區域衝突。其中以中共可能進行的軍事攻擊最直接，也最嚴重。中國由於軍力強大，從偶發性脅迫到全面進攻，有數十種威脅台灣的方法。中國對台灣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使北京在採取軍事行動的時間、程度與地點上，都享有極大的自由。在1996年解放軍演習高峰期，李登輝提到他有18套戲本，足以對付可能發生的軍事狀況，台灣媒體表示，李登輝指的是「台、澎、金、馬防衛作戰計畫」或「固安計畫」列出的18種狀況。外界很難揣測台灣將如何因應大陸的軍事威脅。研究台灣的國防政策，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對台灣軍售方面，首要的軍事目標是反制解放軍入侵，並儘量增加台灣存活與支撐的機會，台灣的國防政策以「有效嚇阻」與「防衛固守」為最高指導原則。「防衛固守」屬於政治宣示，強調台灣決心將軍力用於防衛包括離島在內的領土，寸土必守，寸土必爭。「有效嚇阻」乃是台灣國防計畫的軸心，注重建立一支「難以消受」的軍力，嚇阻中國入侵。台灣在改進軍事嚇阻方面的努力，首先是防禦縱深的加強，其次是防衛作戰的優先順序。由於台灣海峽僅有一百哩寬，加上台灣本身島長而窄，因此台灣無法依賴陸地決戰的嚇阻方式。台灣的國防策士因而歸劃出以下分為四個層次的縱深防禦戰略構想：

1.前線：在兩岸軍事對峙史上，金門、馬祖等外島一向是雙方武裝衝突的導火線，也是台灣國防前哨。由於解放軍以武力直接對付台灣的能力增加，這些防禦設施堅強的外島，做為台灣國防緩衝區的功能日漸降低。不過，他們配備有陸基地對地飛彈與重砲，仍然能讓解放軍的渡海行動受到阻礙。

¹⁵⁰ 同註 140，頁 117。

2.海峽中線：至 1996 年（迄今仍是），台灣海峽有一條無形的中線，維持了中共與台灣之間冷峻的和平。雖然解放軍在 1996 年 3 月 18 日至 25 日之間進行三次軍事演習的最後一次，大可選擇了一個範圍大到足以接近中線的演習區域，並可能試圖越軌，但終究沒有入侵這個「疆界」。

3.海岸線：萬一解放軍取得空中與海上優勢，越過海峽中線，戰線就將進一步東進，達到台灣的海岸線。在這個階段的戰鬥中，台北將使用所有可能的軍事手段，常備部隊與後備部隊、傳統與非傳統的武器系統，防止解放軍進犯本島。

4.底線：在軍事作戰的概念下，台灣島缺乏足夠的防禦縱深，鑒於台灣西岸有著狹長的平原，入侵的部隊可以輕易越過中央山脈，硬將台灣的防禦部隊分散到幾個不同的作戰區。如果台灣的部隊無法固守中山高速公路這條底線，台灣就非常可能淪陷。¹⁵¹

配合縱深防禦的戰略概念，台灣防禦作戰的優先順序為制空、制海與反登陸作戰。這個原則不僅是台灣建軍備戰的準則，也決定了台灣的武器採購計畫。以上是台灣軍事謀略的作為與生存發展的軍事謀略構想。

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重要智囊，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中共評論》發表〈中共現代化的艱巨而複雜的整合?論國家的最終統一〉的文章中表示，中國問題的本質，不是簡單的統獨之爭，也不是族群、省籍之鬥，而是中國人民對自己未來、命運、利益的一種選擇，統一必須能讓中國同胞共同締造更美好的中國，才會成為中國人最明智的選擇，因此統一問題只能在中共現代化進程中通過整合加以實現。文章中並強調，台灣人民對統一的本質還相當迷茫，還感受不到統一的好處，因此只能設法催熟統一條件，也就是把工作做到廣大民眾的心坎上，爭取多數人的認同。¹⁵²此一觀點頗合乎歷代實現國家統一的指導原則：爭取政治優勢，為統一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也是目前讓我們看到的最理性和具有善意的聲音，在民族情感上也較有說服力。可以嗅出上海涉台系統在台灣問題上和北京的不同思維。然而中共軍演提昇台灣人民恐中、仇華的意識，可以從李登輝

¹⁵¹ 李潔明·唐思合編，黃介正，〈台灣對於兩岸軍力對比及其挑戰的看法〉，《台灣有沒有明天》（台北：先覺出版社，1998），頁 317-322。

¹⁵² 轉摘自葉自強，〈1996 年至 2001 年中共對台軍演之意涵〉，《共黨問題研究》，2002 年第 28 卷 10 期，頁 78-80。

的高得票率中反應而出，這點可能是中共對台軍演初衷始料未及的。

二、中共的軍事謀略與區域影響

（一）中共的國家安全目標

過去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論調，在「和平」與「發展」兩個目標之間，最初是因為認定國際環境是和平的，所以可以優先發展大陸經濟。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朝向多極化發展，經濟區域主義興起，加上科技乃是國力基礎觀念成爲世界潮流，中共固然沒有調整以「和平與發展」的國家最高目標，但是重心比起過去已經出現變化。在優先順序上，當前中共是以發展換取和平，但爲確保發展，則必須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亦即後冷戰時代「新安全觀」的功能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發展換取和平，一是以和平換取和平（發展），較過去更強調策略性（strategic）意涵。所謂以發展換取和平，基本上是根據「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傳統思維，將「和平」與「實力」掛勾（peace through strength）。一九九一年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亦來最重要的年代，因爲蘇聯在該年宣告解體，東西冷戰正式落幕，在後冷戰時期，全球及區域體系的發展趨勢具有五大特色：

- （1）一超多元；
- （2）民主化、市場化、及互賴性；
- （3）國內問題普遍成爲各國的首要關切；
- （4）科技成爲推動經濟和軍事發展的主要動力；
- （5）全球性問題增多，諸如國際環保、毒品走私、傳染疾病蔓延等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合作。

中共 90 年代初期一連串的對台軍事演習反映出中共對世界局勢的觀感，與其所認知的國家利益及安全觀有相當程度的關聯；不僅如此，軍演對內對外都有某種程度的宣示意義。「安全」可說是一個國家的基本謀略目標，只有安全的保障才能追求其他的目的與發展。安全其實是一個非常模糊複雜的概念，提到安全的時候，最常涵蓋的面向有兩個：一是威脅（threat），另一是能力（Capability）。主觀的認知經常起源於恐懼（fear），這是引發國際關係間「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問題的主要來源，所以「不存在危險或威脅」或是沒有受到威脅的感覺就是安全，另一方面，一個國家不安全的來源，除了來自外在威脅的感覺以外，本身實力的衰弱也可能是造成一國不安全的結構性來源。國力衰弱容易引發外來攻擊，這是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主張，認為國際關係的現象不外乎弱肉強食，各國爲了求取自保，必須先從提昇本身的實力開始著手，具有自衛能力才能嚇阻外來侵犯。¹⁵³安全從字面上的意義來說是指沒有危險或免除恐懼，依照這個定義國家安全意謂國家沒有危險或者是不受他國軍事威脅的恐懼。安全從適用範圍上來說，可以泛指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安全，此處採取後者的定義。所謂軍事安全意指一國不受他國潛在性侵犯的危險，安全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相對的，因爲不可能存在毫無危險的環境，只能把風險降到最低。但是安全多極化的趨勢，多變化與複雜化，更驅使國際間創造更具功能與作用的軍事安全機制。

「新安全觀」是現今中共綜合安全謀略思想的體現，在冷戰時期，中共安全利益的重點是生存安全，也就是中共軍事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確保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冷戰之後，由於大規模的軍事入侵威脅短期內不會出現，中共安全利益的重心從生存安全轉向經濟安全。國防任務主要是防止侵略戰爭給中共已有的經濟建設成就造成破壞，要爲國家的現代化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¹⁵⁴中共的「新安全觀」在安全內容與實現安全的途徑方面，除了強調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外，也注重政治和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安全、能源環保…等新的安全議題。在實現安全的途徑上，中共的新安全觀在承認軍事安全的重要地位時，也把國內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和外交關係的改善作爲實現國家安全利益、促進地區安全與穩定的主要途徑。¹⁵⁵

中共在 1995 年十一月公布「中共的軍備控制與裁軍」白皮書，其中指出中共的國防政策基本上是「防禦性」的，正如在 1998 年與 2000 年國防白皮書所說一般，中共國防政策的基本目標只是爲了「鞏固國防、抵抗侵略、制止武裝顛覆、保衛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與安全。」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謀略研究部的 2000

¹⁵³ 丁樹範，〈中共與鄰國簽訂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之評議〉《共黨問題研究》，1999 年第 20 卷第 5 期，頁 1。

¹⁵⁴ 席來旺，《二十一世紀中共戰略大策劃—國際安全戰略》（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頁 345。

¹⁵⁵ 劉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略》（台北：揚智文化，1993），頁 243。

年謀略評估中指出，除非外敵入侵或分裂祖國，中共始終將經濟放在最重要的。由此可見，冷戰後中共意識型態的軟化，降低了中共對外的不安全感，也使得他對外的安全謀略有了全新的調整。中共的新安全觀不再強調絕對安全，而是重視綜合安全與共同安全，使得中共安全謀略的手段更多元化也更具活力。依照保衛國家安全所制訂的國防政策稱之為「防禦性政策」，中共多年來都宣稱其軍事謀略為「積極性防禦政策」，也一再表明中共不稱霸、愛好和平的決心，武器的購置只是為了保衛國家的安全。美國軍事謀略學者格雷賽（G.Glaser）認為中共與亞太互動的層面來看，中共「防禦性」軍事謀略的意涵有三：

- 1.中共不會用競爭性的軍事謀略來主導亞太的安全秩序，即是中共無意尋求絕對性的安全，更無益追求亞太的霸權。
- 2.中共願意以積極性的國際合作政策來促進新的亞太秩序，此包含中共將以和平的方式，也就是非軍事手段來解決本身與亞太成員之間的潛在紛爭，以及中共將加強國際的合作互動來緩和亞太地區的緊張因素，提昇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
- 3.中共在軍事作為上願意從事相對性的透明化。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新安全觀」逐漸成為中共口徑一致的官方立場，強調「新」，主要是為了突顯出與過去的不同，表示中共對國際環境認知出現變化，也隱含中共相關政策將作調整。中共學界針對國際情勢的演變與安全觀念的論調，強調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中，應該具有動態的安全觀，亦即變動是常態，沒有絕對的和平，區域衝突或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衝突仍然不可避免，但不必然因此而引發如冷戰時期的大規模戰爭。¹⁵⁶

（二）中美看台灣問題

台灣被中共視為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問題，也是中共和美國分歧的焦點。說美國打"台灣牌"就說明中共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利用台灣遏制中共的看法。根據此種看法，中共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退讓，加強了台獨勢頭，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¹⁵⁶ 謝勝義，〈中共軍事戰略理念之探討〉《俄情雜誌》，1995 年第 4 卷第 3 期，頁 13-14。

的迴旋餘地縮小。90 年代對台軍演之時，民進黨尚未執政，中共雖對李登輝不具信心，但對國民黨政府倒向中間路線尚無立即的焦慮感，直到陳水扁登台之後對台灣問題方才感到某種程度的急迫。

學者蔡瑋在其〈第三次台海危機：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互動〉一文中提到：中共的所採取的軍事策略是堅守原則、寸步不讓、分清主從、區別對待、兩手策略、交互運用、適時解決、各個擊破、縮小打擊面、擴大爭取面，封閉一切溝通管道，迫使台北上桌談判；台北則是拉長戰線、轉移目標、四處閃躲、迴避決戰，既不隨便妥協，也不輕易開啓戰端，美國的策略則是務實取向，盡可能原則承諾，但不具體讓步，對台海兩岸政府同實施壓，避免惹火上身。另外，中共在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的行動時，所採取的是先穩住（改善）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然後全力處理和台灣之間的歧見，先讓台北感到可能被出賣可能，同時加以粗暴的文攻武嚇手法迫使台灣就範，而且其中還有傳統手法，將李登輝與台灣人民分開對待，使李登輝感到腹背受敵的壓力。北京所採取的是「戰爭邊緣策略」企圖以戰迫和，讓台北在戰爭的陰影下知所進退。¹⁵⁷以北京和美國的互動情形來看，危機期間中共對美國多半止於口頭叫罵，但行為則相對較有分寸、理性，而且求同存異，不搞對抗的基本政策並無改變。對中共來說，北京與華府之間有更多、更重要的國際及區域性問題有待解決，雙方確實是處於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情況，因此只要美國能滿足中共的原則性要求，北京犯不著爲了台灣問題和美國全面決裂。¹⁵⁸

中美對於台灣問題看法差異，有可能導致台海局勢失控，所以溫家寶訪問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強調中共立場，成爲訪問的重要議題。中共深刻體認到未來考量武力犯台前可能與美軍抗衡，中共認知其整體軍力短期無法取得全面性優勢，如何運用廉價科技及戰爭面對抗美軍的高科技，進而有效地削弱美軍在太平洋的軍力優勢並獲得犯台的勝利。因此，不對稱作戰受到共軍相當程度地重視與研討，從集中兵力，積極進攻到初戰決勝三原則中，積極推動相應的理論論證與戰法探討，中共解放軍正積極運用此一概念尋求我方特點與弱點，順應作戰環境在我不

¹⁵⁷蔡瑋，〈第三次台海危機：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互動〉《東亞季刊》，1996 年第 27 卷第 6 期，頁 38。

¹⁵⁸林宗達，〈中共演習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碩士論文，1996），頁 39—40。

及獲得外援前，企圖一舉殲滅或重創我海、空軍主力部隊。其次共軍對台「不對稱作戰」係以台灣人心脆弱為前提，研判台灣人民經不起「要點被突破」的心理撼動，或參考解放海南島戰役外線作戰模式，在裡應外合下透過空前強力的武裝奇襲行動，一舉突破台灣的心防，產生土崩瓦解的效用，「以小的犧牲獲取至大的戰果」。

(三)「海峽九六一」決策的制訂與執行

1996年3月8日，中共人民解放軍發射3枚M—9短程飛彈，二枚朝向南面的封鎖區，一枚朝向北面的封鎖區；3日後又發射了4枚飛彈。這項由中共政府宣布代號為「海峽九六一」(Strait 961)的大規模演習，除達成演訓的目的之外，更有藉軍演展現北京在必要時運用所有可用的傳統或非傳統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以遏止台灣走向獨立。¹⁵⁹根據美國海軍情報署的一份解密檔案文件，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導這項「海峽九六一」演習的籌畫並核准執行，整個演習是為攻佔台灣而準備，必要時攻佔台灣的演習在1994年一項「指揮所演習」(Command Post Exercise)曾經展開過，但這次3月8日至15日的演習卻是歷年來最大的一次。實際上，「海峽九六一」演習是從2月4日起各部隊朝南京軍區集結。參與演習的部隊包括三個艦隊(北海、東海、南海)的部分艦艇，空軍的戰機、直昇機與伊留申七六型運輸機、主要來自南京軍區的地面部隊、二砲部隊(戰略飛彈部隊)，以及至少一支配備SA—10B的空防飛彈單位。美國海軍情報署研判參加「海峽九六一」演習的部隊原先大都不在南京軍區，而是在「特60」的行動中被動員趕往該軍區集結。至於「特60」則是指部隊集結完成後，必須在「海峽九六一」演習3月8日展開的60小時內完成緊急動員與先期部署。¹⁶⁰該解密文件指出「海峽九六一」演習在台灣海峽兩端分成南北兩個演習區。從每個演習區部隊的組成與配置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軍委會籌劃的目的。在東山南澳島演習區部署的部

¹⁵⁹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Chinese Exercise/Strait, 961: 8-25, March, 1996," Report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1996, at (<http://www.gwu.edu/sarchiv/NSAE/BSAEBB19/14-01.htm4-10.htm>)

¹⁶⁰ 蔡瑋，〈第三次中共對台軍演：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互動〉，《東亞季刊》，1996年第27卷第6期，頁95-97。

隊主要為空軍的空對空戰機、戰鬥轟炸機與支援海軍作戰的空對地攻擊機，以及海軍的驅逐艦、護航艦、巡洋艦與核子、柴油潛艇，目的顯然是在演訓入侵台灣初期維持空優及海優能力。而在北福建平潭海壇島部署的部隊主要為地面運輸部隊、兩棲部隊及必要的空中支援及海上護衛部隊，反映演習的目的在於訓練人民解放軍打登陸戰的能力。「海峽九六一」演習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從 3 月 8 日開始，以飛彈試射為主；第二階段從 3 月 12 日開始，以海空軍實彈火炮射擊為主要演訓形式；第三階段從 3 月 18 日到 25 日，以登陸戰的演訓為主。由於 3 月 8 日到 15 日間的兩個飛彈封鎖區都十分接近台灣兩大商港及鄰近的海軍基地；因此美國海軍情報署認為帶有強烈的挑釁意味。北面的封鎖區距離基隆 19 海浬，南面的封鎖區距高雄 30 海浬。¹⁶¹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張萬年在兩個演習區都全場坐鎮，兼領軍委會主席的江澤民原也有意視察，凸顯中共對台軍演的重視程度。

中共中央軍委會敢在台灣海峽大張旗鼓展開挑釁意味十足的軍事演習，不僅是因為中共認為美國的警告是虛聲恫嚇，而且自信已有透過核子導彈對美國進行反威脅的能力。1995 年 10 月曾任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傳譯及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Jr.）卸任後訪問北京時，中共「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告訴他，共軍為了遏止台獨是有打核子戰的心理準備，必要時犧牲數百萬民眾與幾個城市也在所不惜。雖然美國也可能有所反制，但熊光楷認為美國將很難為了台灣犧牲洛杉磯。¹⁶²但事實上中共也低估美國深為核子大國所持有的信心，中美雙方在核子實力上的強烈對比，要說中共在 1995—96 年台海危機中對美實施核武威脅產生效果也太過牽強，因為如果中共核武威脅成功，美國根本就不敢派遣兩個航母艦隊戰鬥群到台海附近。

第二節 中共軍事謀略的資源要素(Resources)

這一節探討中共軍事謀略的資源要素，在時間上以 1995-96 年台海三次危機為主要的範圍，在研究標的物方面則以現今影響軍事事務最重大的軍事事務革命和信息戰為範圍，並視其為軟體；另外針對中共在對台軍演相關的軍備提出分

¹⁶¹ 同上註，頁 99。

¹⁶² Barton Gellman. "U.S. and China Nearly Game to Blows in 1996," *The Washington Post*, (1998.7.21), pp.334-335。

析，這是硬體的部分。透過軟硬體的謀略分析，找出其間軍事謀略的著眼及影響以爲吾人參考：

一 軍事事務革新與信息發展（軟體層面）

如前第二章第三節所述，中共解放軍在 95 年和 96 年的演習動用資源，是中共軍事變革的成效之一，展示了中共軍事變革的一定的軍力及高技術條件下練兵的驗證，也一定程度達到了「威懾」的軍事政治上謀略效果。費學禮（Richard d. Fisher Jr.）指出「解放軍飛彈戰力改善的成效，和其技術整合、組織重整，提高運用新系統的能力，互爲因果，新的科技必將衝擊結構上的改變」。當然對作戰指導、軍備、武器系統與軍事謀略產生相應的變化。¹⁶³

其次中共的軟體層面爲信息戰，信息戰（英文爲Information Warfare；我國通譯爲資訊戰，中共通譯爲信息戰）是由美國空軍在 1984 年所提出來的一種新形式的戰爭或作戰概念。這種作戰概念產生的背景是信息技術革命性的發展以及在軍事領域中的發揮與運用。信息技術上具有革命性的突破主要在於數據化的信息工具與信息高速網路的建立，使得傳統作戰部隊演進到以信息系統爲基礎結合指、管、通、情、偵、蒐與智能化武器運用形成戰力的智能化武裝力量。1991 年以美軍爲首的多國部隊在反擊伊拉克的海灣戰爭中打了一場精彩和一面倒的「信息戰」，以完全取得戰場制「電磁權」，在極短的時間內完全癱瘓了伊軍的指揮系統，因而確立了「信息戰」主宰未來戰場的重要地位。¹⁶⁴中共解放軍對信息戰的思維與理論研究，庶幾能歸納解放軍研究信息戰的動機與理念、理論與論證，以及在什麼樣的軍事範圍運用信息戰的動機與理論，以及解放軍如何論證在未來戰爭中運用信息戰的戰術戰法等。雖然自 1991 年海灣戰爭後，信息戰已成爲國際軍事學術界熱門研究與探討的課題，但是在解放軍最高軍事學府如軍事科學院與國防大學，一直到 1995 年末，1996 年初始見對於「信息戰」研究與討論的文獻。¹⁶⁵

中共解放軍對信息戰在軍事運用的理念發展，初期是消化整理西方先進國家

¹⁶³ 費學禮，〈中國飛彈飛越台灣海峽的政治與軍事評估〉（台北：遠景出版社，1998），頁 241。

¹⁶⁴ 徐根寶，〈關於戰區信息系統的建設問題〉，《軍事學術》，1987 年第 10 期，頁 62-64。

¹⁶⁵ 孟捷慕，〈轉向〉（台北：天覺出版社，1999），頁 182。

所提出來的信息戰理念。王保存（1997）整理西方先進國家所提出來的信息戰的理論，歸納信息戰理念與定義分為四方面：一、信息戰的任務是通過影響敵方信息和信息系統，運用己方信息和信息系統來取得信息優勢，支持國家軍事戰略；二、在軍事信息環境中，通過信息採集、處理等手段並根據信息採取行動來加強己方部隊力量，保護己方部隊的能力，以便在各種情況下實施勝敵一籌的、不間斷的軍事行動；三、信息戰是以奪取決定性軍事優勢為目的，以實施信息管理和使用為中心，進行武裝鬥爭的手段；四、信息戰是利用信息達成國家目標的行動，也可以把信息戰視為部分地區通過全球聯網的信息與通信手段進行的國家衝突。此四種概念被視為信息戰的廣義（Macro Concepts）概念。而狹義（Micro Concepts）信息戰的概念是指「戰場信息戰」或「指揮控制戰」，亦即以情報為後盾，運用多種信息手段摧毀或削敵之C3I能力，同時保護己方之C3I能力不被削弱。¹⁶⁶

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環境的轉變，中共亦將其原本的全面備戰軍事思想形塑成更為彈性且符合世界潮流的『現代軍事思想』。在多方分析中共於冷戰後期軍事思想和軍事謀略的影響因素後，吾人認為有下列三項因素（軍事事務革命的影響、未來戰爭型態、國際謀略環境的判斷）深切地涉入了中共現代化的軍事思想、謀略的演變過程。進入九〇年代以後，中共特別著力進行軍事事務革命，以求實質上能真正與美國等強權抗衡，而不僅是心理層面的爭鬥。

當今，先進的技術和武器系統、創新的軍事理論、科學的編制構成，構成新軍事革命的三個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在未來的信息化戰場上，知識將成為影響戰鬥力生成和提高的主導因素，戰場較量將更突出地表現為人的智慧和技能的較量，表現為人在戰爭中的自覺能動性的較量。正是在信息時代人類軍事實踐飛速發展的背景與條件下，軍事理論創新的意義顯得更加突出。當軍事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提出了眾多新的問題，原有的軍事理論難以對此作出準確的解釋時，人們就不能不對實踐所提供的新的課題作出新的分析、概括和抽象，形成新的觀念、新的方法，這樣，創新軍事理論便成為必然。先悟者明，先手者利，要想在軍事理論創新的競爭中占有有利地位，就必須不斷增強創新軍事理論的緊迫感與使命感，加快軍事理論創新的步伐。

¹⁶⁶ 過平，〈信息戰淺析〉，北京《現代軍事》，1999年第20卷第8期，頁50-52。

二 軍事現代化與軍備建設（硬體層面）

中共軍事問題專家鍾堅指出，由於國情不同，中共武器自製能力無法精確地做一比較。雖然中共以前的武器製造都以全自製為目標，並且可以外銷，但目前高科技武器的製造上，卻與我國一樣，面臨自製率不高的困境。國策研究院專任副研究員歐錫富表示，台海兩岸在高科技武器的自製上常必須依賴外國技術。以我軍的IDF經國號戰機為例，其中約百分之六十的零組件須賴進口，尤其是飛機關鍵引擎的製造，仍需由美國提供。在共軍方面，目前與俄羅斯合作生產的蘇愷二十七型戰機（殲十一），雖為分階段提高自製率，但中共最高只擁有百分之七十的自製率，飛機製造中最重要的技術，如AL-31F引擎的製造，俄羅斯基於科技領先的謀略考量，並未轉移給中共。¹⁶⁷在自製率無法提昇的情況下，雙方在外購高科技國防武器亦遇到相當的困難，雖然如鍾堅所言，台海兩岸的軍備整建只是全球謀略改變考量下的換代問題，無涉於軍備競賽，但在高科技領先國家的謀略考量下，中共在高科技武器的購買，往往得視軍售國的政治、謀略、與經濟考量而定，而台灣在中共外交的打壓下，軍購尤其困難。目前台灣最主要的外購武器來源為美國，但因內政、外交的考量，美國對我軍售狀況常有所變動。受中共政治壓力較小的荷蘭與法國，基於經濟因素的考量，對我也有少數戰機與潛艦的軍售，但國策研究院專任副研究員歐錫富形容，這有點類似棒球上的術語「打帶跑」，無法長期持久。

根據美國《新聞週刊》的報導，中共目前大力推動軍隊現代化的主要目標是威懾台灣，以嚇阻台灣走向台獨；另一個對象是美國，以防止美軍在中共發生軍事衝突時防衛台灣。不過以目前解放軍的實力尚不足攻取台灣，解放軍尚須數年時間才能完成攻台部署。近年來中共大肆向俄羅斯採購新式裝備，從最近引進包括戰機、驅逐艦及常規攻擊潛艇等武器上看，有很多適合於對台作戰。因此，解放軍現代化目標非常具有針對性。然而，解放軍要打破台海均勢，首先空軍要具備對地攻擊能力，海軍則需配備類似俄製反艦導彈後才有可能，¹⁶⁸另外解放軍也

¹⁶⁷ 鍾堅，〈國軍兵力整建：海軍整建整備研析〉，《台灣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的未來展望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防政策評論，2001），頁10。

¹⁶⁸ 元樂義，〈中共完成攻台部署還需十年〉，《中時電子報》，

經常提及，科技練兵需要「以消化促轉化，以深化求發展」，中共也需要花幾年的時間來消化俄製裝備，正可以說明共軍對科技消化的緊迫感。在武器裝備現代化方面，中共導彈能力的提昇尤其令各國所關切。中共在洲際飛彈部分，以成功試射使用固態燃料、機動性強、具多彈頭能力的東風三十一型飛彈及發展潛射的巨浪二型飛彈。中短程導彈則有東風二十一型、東風十五型（M-19）及東風十一型（M-11）導彈，在數量上及品質上均大幅改善，預計至 2005 年將增至六百五十枚。¹⁶⁹根據學者分析，中共武力與西方國家還差一代，在質的方面也不如台灣。近幾年來中共武器裝備的發展也可看出，中共以往奉行「積極防禦」的國防謀略觀，事實上已明顯轉守為攻，並完成軍事謀略轉移，開始向追求海上強權的方向發展。¹⁷⁰在中共軍事現代化方面，根據藍德公司的研究指出，在 2015 年前，中共將有能力阻擾美國亞太謀略、挑戰美國軍事優勢、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競爭者，同時，對美國具有核武威脅的能力。¹⁷¹在此一情形下，中共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就成為世界各國矚目的焦點。在 1995、96 年中共對台軍演之初，遭李登輝訕笑為「空包彈」的衝擊，以及之後各國與美國強化的防衛陣線，反倒激起中共決心徹底革新其軍備實力的反省與決心，中共於 90 年代後期進行的軍備採購與軍隊構成的調整，可以看出中共提昇軍隊戰力與素質所下定的決心。

表 4-2：報導中的中共軍備採購

種類	系統	來源	數量	備註
戰機	蘇剷二十七側衛式	俄羅斯	50	中共將利用組合零件裝配更多此型戰機，最後自行製造。
驅逐艦	現代級 (Sovremenny)	俄羅斯	2	這兩艘軍艦原本為俄羅斯海軍訂購。
潛艦	K 級	俄羅斯	2	外銷型。

<http://ctnews.yam.com.tw/news/200012/12/81167.html>

¹⁶⁹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00, p.11.

¹⁷⁰ 羅廣仁，〈中共分治五十年後看中共軍事戰略〉，2000.12.25，參閱 <http://210.69.89.7/mnd/101/101-12.html>。

¹⁷¹ Zalmay Khaliz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Santa Monica: Rand, 2001),p.141.

	(KILO877EKM)			
潛艦	K 級 (KILO636)	俄羅斯	2	首度出售與俄羅斯海軍同型的潛艦。
地對空飛彈	SA—10	俄羅斯	不詳	機動型與固定型。
地對空飛彈	SA—15	俄羅斯	15	先進的空中與海上偵察雷達。
雷達	(Searchwater)	英國	6-8	供殲八、殲十戰機使用之先進雷達。
雷達	Zhuk 改良型	俄羅斯	150-200	艦載反潛作戰直昇機。
直昇機	Ka-28KELIX	俄羅斯	12	多功能直昇機。
直昇機	海豚(Dauphin)	法國	不詳	
直昇機	Mi-17	俄羅斯	28	雷達導引，類似美製之麻雀飛彈。
空對空飛彈	Aspide	義大利	不詳	裝配於現代級驅逐艦上之超音速掠海飛彈。
攻船飛彈	SS-N-22/3M80 日灸/蚊式	俄羅斯	不詳	重型運輸機。
運輸機	11-76CANDID 型	俄羅斯	不詳	

資料來源：Zalmay M. Khalizad & Abram N. Shulsky.(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p.51.

在軍隊結構調整上，1985 年在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建設強大「正規化」、「現代化」軍隊的口號鼓吹下，共軍開始走向精兵政策。在完成歷史性的百萬裁軍後，軍隊的編制和體制進行了重大的變革，三軍結構也發生歷史性的變化。陸軍改為合成集團軍，砲兵取代步兵成為陸軍第一大兵種。專業兵種數量也第一次超過步兵，砲兵、裝甲兵、舟橋兵、工程兵、通訊兵、防化兵…等特種兵部隊，占陸軍員額 70%以上。此外，增加了陸軍航空部隊、電子戰對抗部隊、氣象部隊、山地作戰部隊及快速反應部隊…等特種作戰部隊，且中共陸軍的機械化程度明顯增加。目前中共解放軍總兵力約二百四十萬人，兵力部屬仍依循積極防禦的謀略方針，以七大軍區為主體規劃戰區謀略構想，在空軍方面，中共與以色列研製的殲十和俄羅斯合作生產的殲十一 (Su-27) 預計 2005 年前服役，並引進AA-12 視距外飛彈、Su-30MKK 戰鬥轟炸機，以及空中預警能力。在海軍方面，中共積極研

發 093 型核動力攻擊潛艦及 094 飛彈潛艦，引進現代級驅逐艦及K級潛艦，並積極引入先進科技改良現有艦艇。陸軍武器換裝進度則延遲甚多，第三代主力戰車（98 式）僅有少數重點單位得以換裝。此外，如戰區砲兵武器及陸航攻擊直昇機…等，皆可能大幅提昇中共陸軍戰力。¹⁷²

表 4-3：中共陸海空軍兵力結構

年代	總兵力	陸軍	海軍	空軍
1978	435 萬	363 萬人約佔 83%	30 萬人約佔 6%	40 萬人約佔 9%
1981	475 萬	390 萬人約佔 82%	36 萬人約佔 7.5%	49 萬人約佔 10.3%
1986	295 萬	211 萬人約佔 71%	35 萬人約佔 11.8%	49 萬人約佔 16.6%
1995	297 萬	215 萬人約佔 72.4%	37 萬人約佔 11.8%	37 萬人約佔 12.4%
2000	240 萬	160 萬人約佔 66.7%	35 萬人約佔 14.6%	33 萬人約佔 13.7%

資料來源：參考「八十九年國防白皮書」及張明睿著《中共國防謀略發展》，其中二砲部隊未列入，1995 年為 10 萬餘人，約佔 2.24%，2000 年為 12 萬餘人，約佔 5%，此外尚有 1987 年成立的防空砲兵，及 1988 年成立的陸軍航空兵。

美國研究中共的謀略學者史塔克斯（Mark A. Stokes）指出，中共的謀略現代化可能會造成二十一世紀初台海軍事情勢的重大改變。中共對先制長程精準攻擊、資訊優勢、指揮與管制作戰及整體防空作戰等之重視，可能會使人民解放軍擁有瓦解台灣遂行戰爭的能力。雖然北京有許多其他方案可供選擇，如奪取外島或實施類似 1996 年三月的飛彈演習，但癱瘓台灣的軍隊，將可使北京在遭受相當少的傷亡且不會對台灣造成全面性破壞的情形下，達成其目標。¹⁷³因此，如何維持台海軍事平衡，避免刺激中共採取更積極強硬的對台政策，值得深思。依照中共評論家們的看法，軍事事務革命驅動了四項作戰領域，也就是資訊作戰、精準打擊、謀略機動與太空作戰。近年來，中共的年度國防經費以超過 10% 的年增率快速擴張，以「跳代換式」的方式大量採購俄製先進武器與載台。1996 年中共於台海所舉行的軍事演習首度展示了高技術條件下打一場現代化聯合作戰的能力：導彈突擊、電子作戰、海上封鎖及兩棲垂直登陸，均為此海峽軍演的重

¹⁷² 李澄等主編，《建國以來軍史百樣大事》（北京：知識出版社，1992），頁 332-382。

¹⁷³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Mark A. Stokes 著，《中共戰略現代化》*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頁 136-137。

第三節 中共的領導統御層面（Leadership）

1995 年至 96 年的中共軍演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哪個人作的決定？為何如此決定？我們從現有資料中，分析可以看出是江澤民所下的決定，其目的不外是影響台獨，阻扼美援及確立江澤民對軍隊的領導。但這個決定與中共歷年決策究竟有無不同，領導人如何作決策？有何影響？對我有何啓示均需研究，以明中共權力結構和決策模型之運作。

一 領導人的謀略思想

（一）決策模式的種類

1. 個人獨斷決策模式

毛澤東在 1938 年就提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要爭黨的兵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是槍指揮黨」。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是與那種有軍則有權、誰的槍多誰就勢力大的觀念完全對立的。鄧小平提出以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為新時期軍隊建設的總目標。而革命化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求軍隊堅持黨的絕對領導。雖然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第三世界國家常常出現的軍事政變。在中共，軍隊勢力最膨脹的時期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九大前後，林彪成為中共黨章所規定的接班人的時期。那時軍人在政治局中佔有較大的比重，有黃、吳、李、邱等多人。當時軍方提出，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領導、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毛聞之甚為惱怒，說「難道領導就不能指揮？」中共始終堅持不變的是黨的領導，一黨專政。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共共產黨。」黨的領導被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中，鄧小平把堅持黨的領

¹⁷⁴ 鍾堅，〈國軍兵力整建：海軍整建整備研析〉，《台灣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的未來展望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防政策評論，2001），頁 7。

導作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最根本的一條。¹⁷⁵江澤民則言必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一黨專政是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和毛澤東所發展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理論所決定的。這才是中共真正的「立黨之本」、「立國之基」。¹⁷⁶

2. 集體領導決策模式

所謂黨的總路線是指在一個時期內黨的工作中帶有全局性的謀略主攻方向，亦稱基本路線。當著革命或建設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或建設的謀略、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即針對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關係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謀略方針。

鄧小平批評說「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而變成個人領導」，並提出「集體領導」和「黨政分開」，（但事實上他未能貫徹執行，仍然把堅持黨的領導當作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一項。）他自封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享有對國家大事的最終決定之權，居於一言九鼎的地位。在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一貫左右搖擺，每當左的傾向阻撓了改革開放，他固然要舉起右手反左，而每當改革開放步子過大，他感覺到足以威脅一黨專政，他必然舉起左手反右。終於在 1989 民運發生時，他為了維護一黨專政，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採取武裝鎮壓，製造六四慘案，也斷送了他自己提倡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就是為什麼朱鎔基怕被稱為「中共的戈爾契夫」，以及為什麼人們先希望鄧小平，後希望江澤民能夠成為蔣經國都落了空的根本原因。也正因為如此，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和「允許資本家入黨」不過是中共逐漸喪失工人階級的政黨的本質，轉向資產階級甚至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即使「三個代表」論被納入中共黨章，也完不成向社會民主黨轉化，只不過從「左翼專制政黨」轉向「右翼專制政黨」而已，但是從這個

¹⁷⁵黃筱薌，《中共意識形態之演變與運作研究》（台北：俄情研究雜誌社，1992），頁 85-90。

¹⁷⁶補充說明：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概括地說，即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共產黨絕不與其他政黨分享政權；即一黨專政，一黨專政表現之一是黨政合一，黨凌駕於政和其他一切組織之上；一黨專政即黨內少數領導人專政，集中到一點即最高領導人個人獨裁。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莫不如此。毛澤東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理論，即「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又提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以及「書記掛帥」。同上註，頁 40-45。

時期也可看出中共漸漸轉向集體領導決策模式的過渡特色。由於中共政治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共的政權更替沒有正規的、程序性的民主機制，加以中共最高領導人往往以個人意志凌駕於組織之上，人治色彩濃厚，中共政治最大的特點之一是不可預測性。不與其他政黨分享政權，堅持一黨專政是中共的不變因素，除非它不再是共產黨了。一黨專政是中共的命根子，是中共特權的來源。由此引發出來的就是極權政治，拒絕政治改革，以及運用國家機器和輿論工具壓制人民的呼聲和反抗。在這一點上，中共領導層其實無所謂「保守派」與「改革派」之分，二者都盡可能維護一黨專政的體制，儘管可能有不同的口號。

（二）江澤民時期的決策特色

1.江澤民與過去領導人的不同點

江澤民及其政治局同僚所組成的中共第三代領導班底，與其前幾代的領導人相較，不論在人際網路或官僚經驗的廣度等方面，都顯得相對侷限。第三代領導人的特色是，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待在同一個機關或區域，缺乏跟軍隊、黨機關、國家機關或經濟機關方面的接觸。（但也因此他們的經驗顯得更佳專業化與特殊化，進而形成在政治領域中分工合作的專業官僚特徵，例如朱鎔基的經濟官僚角色。）江澤民作為第三代領導班子的核心人物，在政治資歷上並不比其他的領導人具有權威，所以江在建構領導權威的時候，必須藉由和不同利益關係團體間的「合縱連橫」始能掌控權力。而江澤民也必須透過給予這些利益團體報酬，以維繫對他的支持。此外，江澤民與其他領導人在政策議題的互動上，也必須透過談判協商的方式給予承諾，以換取施政的順利。這將造成他在面對軍隊、官僚機構、地方機關…等利益團體時呈現相對弱勢的地位。綜上所述，江澤民若要掌控權力並維持權力，就需要建構一個強而有力的聯盟來支持他，而軍隊在這過程中佔有最主要的地位。換取政治上的支持所費極大，他必須負擔可觀的政治債務以回報支持者，且江澤民對於這些利益團體的承諾與回報無法輕易改變，因為改變承諾或降低回報將可能造成支持者轉而支持領導層中願意給予更加優惠利益的領導

人。¹⁷⁷

2.江澤民的權力來源

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來源有二：一來自領導人本身在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獲得的威望，這是無法轉移到他人身上的。另一來自領導人在黨政機關中所佔有的職務優勢，這一種權力會隨著領導人的更替而轉移。隨著革命元老的消逝，制度性權力移轉成爲後強人時期的特徵，因此擁有最高領導人的職位者，相較於其他領導人，將擁有更多的政治資源和權力。除此之外，江澤民的個人領導風格和中共傳統政治服從權威的特徵，也幫助江澤民獲取權力的正當性和掌權後的平穩性。¹⁷⁸

(1) 制度上賦予的權力：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位，使他在中共內正極國際政治上獲得高曝光率。而這些制度性職務所附與的權力，使江澤民能夠安插親信在重要職位上以廣植政治人脈。同時江澤民在軍中也藉由晉升高階軍官、提拔專業軍官，以扶植自己在軍中的權力基礎。此外在軍委主席的權威方面，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1994 年 5 月 12 日通過「中共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修正案。此修正案的要點有三：

- ①取消原案的「一級上將」軍銜；
- ②中央軍委會不授軍銜，而副主席的軍銜編制爲上將；
- ③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與中央軍委委員晉升上將軍銜由中央軍委主席授與。

國內學者丁樹範認爲這些修正至少代表兩項意義：

- ①中央軍委不設軍銜表示日後由文人領導，而此文人爲黨的總書記、以貫徹「以黨領軍」的原則。
- ②取消「一級上將」以配合文人軍委主席的權威，在於消除對文人軍委主席領導的可能威脅，間接利於江澤民的統軍，並確立文人掌軍的基礎。¹⁷⁹

¹⁷⁷ David Bachman,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XXXII, No. 11(1992),pp.50-55.

¹⁷⁸ 寇健文，〈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2001 年第 44 卷第 5 期，頁 2。

¹⁷⁹ 丁樹範，〈軍隊角色〉，《中國大陸研究》，1994 年第 38 卷第 3 期，頁 26-27。

(2) 相對弱勢的領導風格：江澤民的領導特質低調且不具威脅性，這跟毛、鄧時期的強勢領導有明顯的差別，就軍隊而言，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強制性介入政治的挫折感，而增加軍隊在政治選擇上的自主性。另外，江的施政風格是不煽風點火，而是在節制的政策施行上，尋求穩定的政治結盟，以降低政治對手的威脅。因此，江澤民的政治權力穩固與否，取決於政策施行的成功度，而非個人權威。

(3) 中共政治服從權威的傳統：中共傳統政治文化，強調鞏固領導中樞以及服從最高領導的權威，致使擁有最高領導職位者得以從職務上獲取威望。就軍隊而言，解放軍是黨的軍隊，「黨指揮槍、槍服從於黨」是解放軍一貫的傳統（這有利於江澤民掌軍）。另外，中共政治文化懼怕「混亂」，因此軍隊和群眾強烈的支持穩定。這種心態下，江澤民以穩定為訴求來獲取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和容易度就相對提高。¹⁸⁰

江澤民從制度性職務上所獲取的權力並非不受制衡，他在黨政事務決策上，受限於集體領導的原則，而必須與其他領導做政策上的妥協。然而，在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上，江澤民擁有其他領導人無法挑戰的權力，例如：任命高階軍官、監督軍隊調動以及同意預算分配…等（這些事務上他妥協的對象轉為軍隊高階將領）。這樣的制度性機制，使中央軍委主席在面對軍隊時，比起其政治局同僚，在獲取個人權威和建立人脈方面相對較為容易。¹⁸¹對江澤民而言，由於其他政治領導人，無法擁有如中央軍委主席一般的獨占權力管道，使他在軍隊決策事務上不必擔心文人領導的挑戰。¹⁸²

二 領導人的軍事思維

（一）江澤民繼續領導「統一台灣」

¹⁸⁰ Lucian W. Pye指出尋求政治穩定是江澤民施政的主要目標，維持黨的獨裁統治是其中維持中共社會穩定、追求國家利益的基本原則；而維持黨的獨裁統治也符合其個人利益。Lucian W. Pye, "Jiang Zemin's Style of Rule: Go for Stability, Monopolize Power and Settle for Limited Effectiveness,"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5(2001), p.46.

¹⁸¹ You Ji, "Jiang Zemin's Command of the Military,"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5(2001), p.133.

¹⁸² David Bachman,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5(2001), p.98.

鄧小平在世時，留下一個跨世紀領導政略，指示接班人江澤民要執行全方位政治任務。然而，鄧所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基本上與中共的極權政治體制具有尖銳的對立矛盾。並且，無論中央或地方的幹部都已貪污腐化、人事權力鬥爭日益嚴重、軍方的未來走向問題重重、經濟改革的財經瓶頸愈來愈惡化、鄉村都市生活差距擴大、地方或民族的分離主義更形激烈…〔廣東等華南地區與中央的分離主義，或西藏、新疆、內蒙古的獨立運動…等〕，這些全國性問題都會造成中共社會動亂的原因。在日漸開放但愈顯不滿的民意浪潮，更有可能成爲另外一次的「六四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因此，鄧後的江澤民中共政權所要面對的重重危機，多得不可勝數。若是其中一個環節發生，均有可能引爆全局崩潰，甚至導致整個權力結構瀕臨瓦解。而且，剛剛接到領導權力的江澤民，爲了應付這些極大難題，他所能運用的籌碼卻是微乎其微。於是，江澤民爲了轉移這些危機與挑戰，莫過於激起「被侵略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歷史情感，來推行鄧所交給他的歷史題目「統一台灣」爲最佳應對政略。這樣，一方面化解這些內部危機，另一方面集中萬眾的注目於外界，使大陸突破被困於內海而直接進出太平洋，並與美國爭霸於海洋，且切斷與東南亞的日本海上交通線。這樣一來，問題就在中共既然無法和平統一台灣，只有採取武力侵犯台灣謀略。所以，江澤民政權爲了掠取台灣，永不能離開槍桿子〔軍方〕的支持。但是江澤民在中共最高軍事統率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雖佔有主席要職，但卻唯一非軍人出身。而且，近年來〔尤其鄧小平死亡前後〕，共軍在中央極權政治的運作中，已扮演著極高權威角色。在這種狀況之下，江澤民需要展現政治領導能力，給予共軍一個軍事表現機會，才能獲得共軍絕對支持。換言之，江澤民必須堅持「武力統一台灣」謀略，且讓軍方完成一場歷史性勝利，才能獲得真正的領導權而成爲中共共產黨真正的領袖，這也是鄧小平所策動的跨世紀安排。

表 4-4：共軍各階段軍事謀略發展過程對照表

	毛澤東時期	鄧小平時期	江澤民時期
客觀謀略研判評估	1.中共貧窮落後 2.共軍裝備落後 3.遭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侵略威脅	1.戰爭可以避免 2.和平可以創造 3.因應小規模局部戰爭	1.戰爭可以避免 2.和平可以創造 3.未來戰爭是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
軍事思想的指導	1.人民戰爭	1.和平時期建軍	1.提昇綜合國力

方針	2.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 3.積極防禦	2.提昇綜合國力為國防現代化奠基 3.質量建軍，精兵路線 4.積極防禦，現代化人民戰爭	2.高科技建軍 3.高技術條件下的積極防禦
軍事謀略理論構思	1.全面戰爭 2.早打、大打、打核戰	1.積極防禦，打局部戰爭 2.謀略防禦與攻勢作戰，先機制敵	1.打贏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 2.高科技作戰條件與現代化人民戰爭的結合
戰役戰術戰法的研練與論證	1.十六字方針 2.十大原則 3.誘敵深入，殲滅戰 4.有限核武，謀略嚇阻	1.軍事威懾與嚇阻，低度核武與謀略導彈 2.快速反應法：空地一體，協同作戰	1.軍事威懾與嚇阻：中度核武與謀略戰術導彈 2.研擬軍事事務革命戰術戰法

資料來源：楊念祖，〈中共軍事戰略的演進與未來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二卷第十期，民國八十八年十月，頁 88。

1985 年中共在其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把「早打、大打、打核戰」的戰爭指導轉變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並決定了未來戰爭的有限性，也就是在「和平時期建設軌道」中之「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¹⁸³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打醒了中共對整體性人民戰爭的迷思，解放軍開始反省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並企圖從波斯灣戰爭中獲得經驗與教訓。解放軍把高技術戰爭加上戰爭的局部性，形成了所謂的「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指導。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亦將改變戰爭的風貌。在資訊科技、匿蹤、精準打擊方面的進展，將使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of Military Affairs）成為海峽作戰必須注意的新課題。

二十世紀出現在當代戰史的持久戰、消耗戰、游擊戰、殲滅戰與主力決戰等戰爭規模與型態，在二十一世紀的未來戰爭中不一定能適用，甚至可能被新型戰爭型態所取代。二次大戰期間的大規模謀略轟炸，足足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才摧毀掉五十個目標；波斯灣戰爭首攻序戰在一天內就打擊了一百五十個目標。前瞻民國 100 年時，國內學者鍾堅博士認為，將在啓戰的第一分鐘內就有可能精確擊破

¹⁸³ 董守福，《軍事思想論叢》（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頁 67。

對方五百個目標，這是未來「不接觸戰爭」火力投射的趨勢。¹⁸⁴事實上，早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維取代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時，共軍就將攻台戰役定調為「速戰速決」。

表 4-5：中共點穴戰戰法

戰術面	攻擊面
首戰即決戰	戰端一開，謀略、戰役、戰術行動即相互滲透，高度融合首戰迅速而直接地發展成爲決戰，勝負一戰便見分曉。
多兵器結合	立足現有裝備，充分利用砲兵、航空兵、戰役戰術導彈綜合攻擊 C31 系統。
指揮控制戰	攻擊指揮體系，使之癱瘓，摧毀個別關鍵設施，即可破壞敵作戰系統的整體性。
用特種分隊	利用特種分隊，潛入敵縱隊，襲擊敵偵察、指揮、控制通信系統，以及戰術火箭等重要目標。
實施軟打擊	充分利用心理戰、戰術欺騙…等，對敵實施軟打擊。
小散遠直	戰場行動的特徵是部隊小型、人員裝備分散、打擊距離遠、指揮層次少而直接。

資料來源：1.趙拴龍，〈首戰即決戰與新時期軍事鬥爭準備〉，《解放軍報》，1998.8.18，版 6。
 2.章德勇等，〈信息遠攻〉，《解放軍報》，1998.3.24，版 6。
 3.呂學泉，〈小散遠直的挑戰—未來部隊編成及作戰行動特徵探析〉，《解放軍報》，1998.8.4，版 6。
 4.廖文中主編，《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頁 316。
 5.林智雄，〈對共軍資訊戰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15 卷第 9 期，2000.3.16，頁 85。

就中共軍方的觀點而言，這種「先發制人、速戰速決」的不對稱作爲，乃爲抵銷先進軍事強權的科技與後勤優勢的有效手段。中共的新準則要求高度的機密性、機動力、高度準確的集中火力及奇襲作戰。此等原則之運用，將可迅速結束戰爭。¹⁸⁵同時軍事事務革命的發展也會改變軍事作戰的遂行。感應器、資訊處理、精準導引以及其他許多領域的技術，無不在快速進步中。欲運用軍事事務革命不僅須革新技術，作戰概念的研發也不能忽視。而作戰概念研發的內容包括：軍事編制的改組、訓練以及部隊的轉型…等。此外，全球化的擴散趨勢的蔓延，更造

¹⁸⁴ 鍾堅，〈跨世紀未來戰爭規模與型態〉，《台灣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的未來展望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防政策評論，2000），頁 85-90。

¹⁸⁵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Mark A. Stokes 著，《中共戰略現代化》*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頁 9。

成包括化學、生物、放射性、核子或加強型高爆武器及其投射裝備與先進傳統武器的擴散。尤其，近年來彈道飛彈的擴散規模更超乎預期，從而使威脅日益升高。

（二）1995—96 年中共對台軍演的謀略目標

中共領導人對軍事演習戰略目標的設定，概可從軍演前後官方講話略窺一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軍事演習前曾表示，此次軍事演習應該算是正常的演習，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舉行這樣的演習是必要的。中共「國台辦主任」王兆國指出軍事演習導彈試射之所以如此靠近台灣，主要是為了表示中共反對台灣獨立的決心。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則認為台灣當局想利用領導人產生方法改變的機會（總統直接民選），為分裂祖國的活動披上合法的外衣。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則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海和南海進行軍事演習，是屬於正常的演習，其目的是為了提高解放軍的軍事素質，提高現代化作戰的水平。由以上中共官方的講話，可以歸納出軍事演習的目標分別有：

1. 為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2. 展示反台獨的決心。
3. 為提高中共「解放軍」的軍事素質，提高現代化作戰的水準。¹⁸⁶

其中第一項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與第二項目標反台獨可說是一體兩面，可以歸納為一項目標，因此就中共官方講話而言，軍事演習的目標有二，其一為反台獨，其二為提高中共「解放軍」現代化作戰的水準。除了官方所表明的目標以外，中共可能還有向世界各國宣告中共軍隊保衛領空與領海的實力。當然其他目標應該還包括壓迫台灣停止選舉、拉低李登輝得票率...等等。中共擔心台灣舉行的總統民選很可能演變成台灣走向實質獨立的有利依據，因此進行大規模演習藉以宣示其決心在中共看來有其必要。

¹⁸⁶戴東清，〈中共三月軍事演習效益之評估〉，《共黨問題研究》，2000 年第 22 卷第 10 期，頁 66—67。

第四節 中共軍事決策機制與軍事謀略（Intelligence）

一、中共國家安全政策體系

事實上，北京對台軍演的目的主要是藉此展現在必要時以武力統一的決心，以阻止台灣走向獨立。此外，北京也想藉此向華盛頓傳達對美國這幾年所作所為不滿及美國不斷的進行干預中國內政的訊息，96年的對台軍演是95年文攻武嚇的延續，在此對中美關係作一檢討：

95年7月中共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會中針對李登輝訪美後中共應對台採取何種政策，出席的除擔任主席的中共「國家主席」、中共軍事委員會主席兼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外，尚有代表軍方的「國防部長」遲浩田，代表外交系統的「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等多位黨政軍情持官員。¹⁸⁷在北戴河會議上，代表外交系統的錢其琛曾主張以平常心看待李登輝訪美一事，認為沒有必要為此大動干戈，以免對已經存在嚴重誤會的中美關係雪上加霜。但是以遲浩田為主的軍方代表卻力主採取強硬政策，建議中共中央以軍事及飛彈演習來強化北京在李登輝訪美後對台灣發動「文攻」政策的效果。最後文攻武嚇的政策在江澤民首肯下拍板定案。¹⁸⁸

中共軍方所提議的強硬路線之所以能獲得採納，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中共軍方對於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看的比什麼都重要，對台強硬主張自可理解。在北戴河擴大會議中，中共老一輩的領導人仍為數不少，早年大多服務於軍旅，即是轉任文職也與軍方聲氣相通，自然傾向支持強硬的對台政策。95年李登輝訪美以後，軍方權力迅速上升與這次北戴河會議軍方立場採納不無關係。¹⁸⁹

其次，平時由外交系統負責的對台政策若不出紕漏，軍方自然也不會主動插手，但李登輝訪美一事卻讓中共高層認為外交系統未能掌握對美政策及對台工

¹⁸⁷ Ken E. Cause, "China's Policy Towards Taiwan,"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1995), p. 565.

¹⁸⁸ 蔡瑋，〈中共對台政策的決策組織與過程〉《中國大陸研究》，1997年第40卷第5期，台北，頁48，蔡瑋訪談大陸學者所得資料。

¹⁸⁹ Michael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and Corporation, 1996), p.565.

作。在李登輝訪美後，江澤民若繼續支持外交系統的對台政策，不僅對一向主張強硬立場的軍方說不過去，也顯得賞罰不明。¹⁹⁰

第三，中共對台研究單位在 96 年以前可說受中國大陸統戰相關人士的影響過深。這些統戰人士每每誇大台獨勢力，力主對台採取強硬立場以遏制台獨氣焰。由於台灣島內民調數據與媒體報導也常朝此一方向發展，中共高層也傾向接受對台研究單位未經深入研究的政策分析報告。¹⁹¹

第四、在北戴河擴大會議召開時，江澤民權益尚未完全穩固，自然寧可失之於保守，也不願顯露出軟弱，而為政敵所乘。¹⁹²儘管如此，江澤民還是在北戴河會議上因勢利導主導整個對台文攻武嚇與對美實施反制政策的制定，並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中全會」上以實際運作需要為由，一舉提拔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為中央軍委委員，架空劉華清、張震兩位老軍頭，加上原先被提拔的于永波與傅全有兩位中央軍委，形成真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軍委領導體制。¹⁹³

對台文攻武嚇政策確立後，人民解放軍於 7 月 19 日宣布將在其後數天於台灣以北的東海舉行一系列包括飛彈試射在內的海空聯合演習。21 日開始，中共連續 3 天對台灣以北 100 海浬的飛彈試射封鎖區發射兩枚飛彈，作為對台灣的警告，但是柯林頓政府卻未對此提出任何抗議，甚至有些行政部門官員還幸災樂禍的表示「李登輝在國會花錢買票取得簽證，美國政府就應該讓他挨一次打」。¹⁹⁴

¹⁹⁰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陳一新於 1997 年 1 月 6 日隨立委訪問團到北京，中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唐樹備曾表示因為李登輝訪美，他差點丟掉烏紗帽，另見石沙，《江澤民的權謀》（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頁 56。

¹⁹¹ 有關司馬遼太郎專訪李登輝一文，見司馬遼太郎撰述，羅逸文譯，《場所的悲哀...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收錄在李登輝，《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頁 46—83。

¹⁹²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陳一新訪談大陸學者所得口述資料，見陳一新，〈柯林頓政府台海危機決策制訂過程一個案研究〉《遠景季刊》，2001 年第 1 卷第 1 期，頁 115。

¹⁹³ 孟捷慕，《轉向》（台北：天覺出版社，1999），頁 113—120。

¹⁹⁴ 李潔明·唐思合編，黃介正，〈台灣對於兩岸軍力對比及其挑戰的看法〉，《台灣有沒有明天》（台北：先覺出版社，1998），頁 330。

Michael d. Swaine 在「共軍如何影響中共國家安全決策」指出「中共崛起成爲一個主要強權，形成了後冷戰時期一個最重大的戰略事件」，作者在 1994 年 11 月、95 年 2 月、96 年 2 月在北京多次訪談，將國家戰略目標、外交政策、國防政策及戰略研究分析與情報，研列了一個基本組織架構，如圖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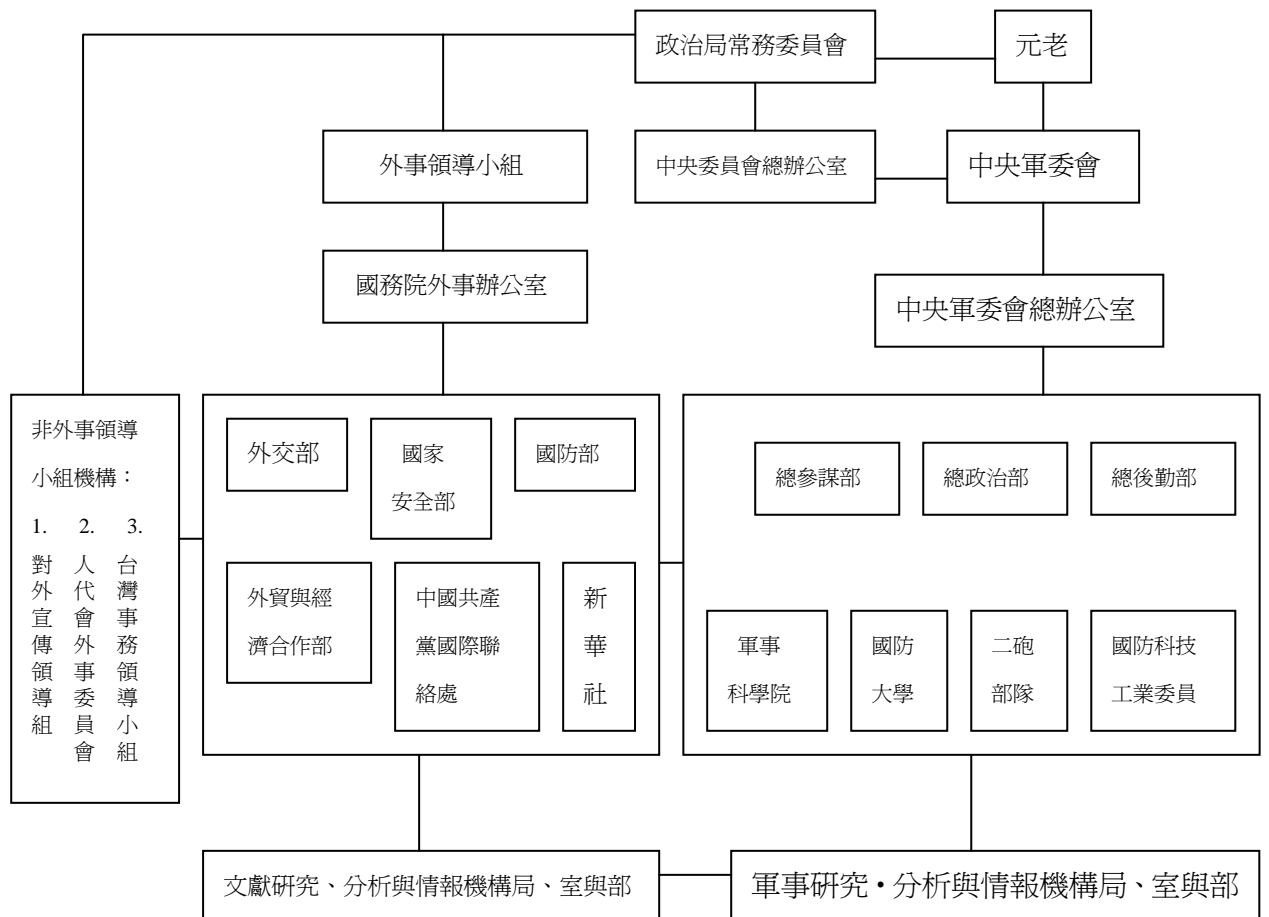


圖 4—1：中共的國家安全政策體系（1994-1996 年）

資料來源：摘自 Michael D. Swaine 在〈共軍如何影響中共國家安全決策〉，頁 23

我們參酌米契爾的分析觀點，從表中可以看出共軍在此次演習中的參與程度甚深，決定了國家的安全政策，其軍事謀略作爲意圖明顯，目的在爭權及鞏固江

澤民的政治地位，而江澤民在前述無軍中資歷及人脈下不得已的決定，這種軍事謀略影響國家戰略及大戰略的情形，恐怕仍然要繼續下去。¹⁹⁵

就長期而論，軍方在中共國家安全政策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會因黨「核心」，亦即黨的高級領導人，與下級政府及軍事領導人和機構間關係的大幅改變而受到重大影響。而此等領導階層之間的關係亦將因社會與經濟的快速變遷對中共政權形成更大的威脅而受到重大的影響。如高層領導結構能夠避免其內部或下級單位對其相當程度的和諧與穩定，構成重大威脅，則中共的政治權力似仍將呈分割之勢。最後在政治體系合理化與制度化的整個過程中，將可能演變為各種公開型式的競爭。其結果可能迫使軍方在各路人馬競相於各種決策中爭取影響力的情況下，祇成為其中的一種制度而已，即使是在國家安全政策方面亦是如此。雖然如此，軍方仍可能是攸關此一轉型成功的重要關鍵，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經驗亦復如此。

二、中共對台軍事指揮系統

吳恆宇先生在「中共對台文攻武嚇與兩岸關係」論文中，特別針對中共 1995、96 年軍演的作戰指揮系統體系作了研究，就圖 4—2 研判表中可觀察，中共「中央軍委」在 1995 年中旬，成立了「對台軍事指揮部」，設在共軍參謀總部中，由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擔任指揮官，共軍總參謀長傅全有擔任第一副指揮官，另一位副指揮官由副總參謀長錢樹根擔任。指揮部下設一辦（辦公室）五組（調研組、情報組、工作組、作戰組、聯絡組），其中「辦公室主任」由傅全有兼任；辦公室設在南京軍區，並在福州、廣州、上海、武漢、南昌各設一個點。而且稍後，中共將南京軍區改稱「南京戰區」，更提昇了中共對台武嚇的壓力。可判斷對台軍演是中共中央軍委的共同決定、江澤民背書的，將台海兩岸推向臨戰邊緣，是軍事謀略攻心戰術運用到極致，其實也徹底的將中共作戰與國家安全指揮體系的優點和缺點暴露，是軍事謀略中「活力對抗」的最佳例證。

依據表列參考國軍之部隊編組，如特設部隊（三軍部隊在一共同指揮官下指揮），中共編成的對台軍事指揮部具有以下的軍事意涵：

¹⁹⁵ 米契爾著（Michael Swaine），楊紫函譯，〈共軍如何影響中共國家安全決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頁 17-23。

- (一) 由中央軍委編成，有利指揮。
- (二) 包含了各軍種可發揮統合戰力。
- (三) 可適時轉換為攻台軍，「戰」、「和」兩手策略。
- (四) 運作重點在南京及廣州軍區，謀略目標確實。
- (五) 具有三軍聯合作戰的統合能力，為軍事謀略重要力量與支撐。
- (六) 受中央軍委令指揮，上下一心，全軍破敵。
- (七) 「作戰組」非訓練單位編組，軍演的目的明確。
- (八) 符合國軍一般情報研斷，攻台以南京及廣州軍區為主的謀略目標。
- (九) 「戰區」展示威攝意涵。

我們從上初淺的分析可知中共攻台軍事指揮系統，可以說是中央軍委會的縮影，傾全國全軍之力，以確保「一個中國」的政策，對台攻略的謀略企圖至為明顯，值得我們深入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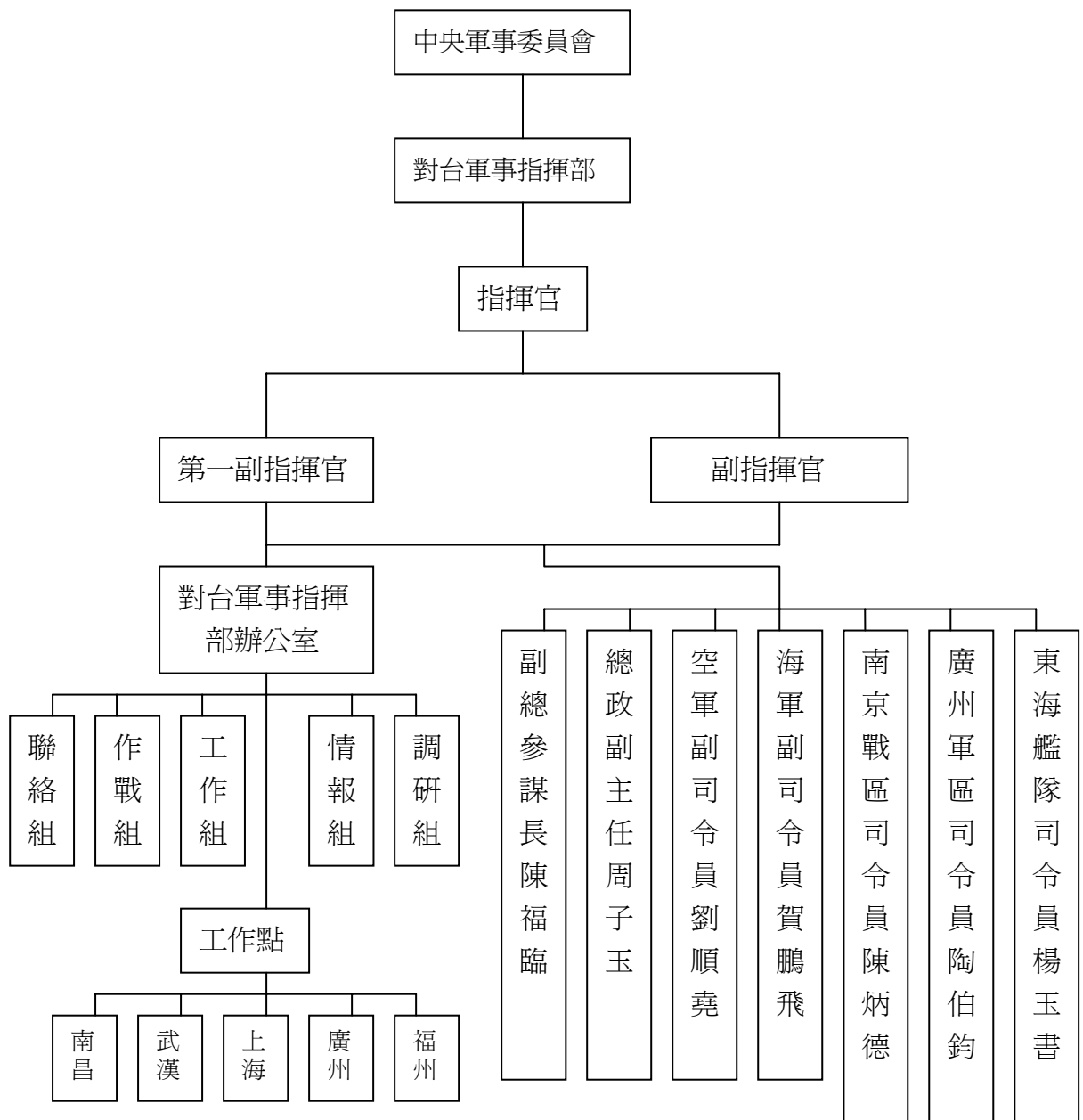


圖 4—2：1995-1996 共軍〈對台軍事指揮部〉研判表

資料來源：摘自吳恆宇先生，〈中共對台文攻武嚇與兩岸關係〉，（台北：政戰學校，大陸形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 85.06.14），頁 2-13。